

# 试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臧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 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 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 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 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 它们如化石一般, 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 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明末清初; 天主教传教士; 中文名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08)01-0050-04

在中文文献中,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大多是以中国式的名字指称的。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学者往往会将兴趣放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著作上, 而对那些他们时常提及的名字本身, 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大多数传教士的中文名, 是他们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中, 在中国朋友(或学生、教友)的帮助下形成的, 有明显的主动取名的成分, 而非后人的音译。其中文名依据一定的规律形成, 在跨文化交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间打下了历史和文化的烙印。它们反映和记录着中西交流的发展, 见证了中西文化相互调和与交融的史实。

## 一、传教士中文名的构成方式

社会学家纳日碧力戈先生曾这样解释外国人的中文名: “一方面, 这是一种文化认同的需要, 是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互动中产生的妥协物……另一方面, 这是一个在命名的过程, 参与其中的是本土文化的解释结构、本土的符号结构、本土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异域因素”<sup>[1]26</sup>。传教士中文名并不是任意选取的, 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种文化在接触、融合中的相互妥协。从其构成方式上看, 传教士们的中文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 1. 全音译类的中文名

之所以叫做全音译类, 是因为其中文名和西文名在发音上有着相当的联系, 中文名中的各个音节全部近似取自西文名, 与当今对外国人名的直接音译有相似之处。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中, 中文名属于此类的最多, 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le Ruggeri)、傅泛济(Francesco Furta-do)、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艾儒略(Giulio Aleni)等。

此类中文名最常见的构成方式是取西文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 在汉字中寻找发音近似的字, 前置作为中文姓名中的姓(如利玛窦的中文姓“利”, 就取自其意大利文姓氏 Ricci 的第一个音节 ri), 再取西文名的两个音节(一半是最靠前的两个), 再寻两个与其发音近似的汉字, 置于汉姓后, 作为中文名(如利玛窦的中文名“玛窦”就与意大利语名 Matteo 发音近似)。方豪先生在为王丰肃作传(Alfonso Vagnoni)时, 也还原了其中文名的形成过程, “‘丰肃’是圣名 Alphonsus 的简译, ‘王’大约是他本名 Vagnoni 第一字的译音”<sup>[2]147</sup>。只不过方先生此处选用的是此人的拉丁语名, 音节 phonsus 比起意大利语名中的 fonso 来, 与“丰肃”二字更为接近。

也有部分传教士仅仅选取西文姓或者名中的部分或全部音节, 寻找发音近似的汉字作为中文名。

最著名的如清初来华的比利时人鲁日满 (François de Rougement), 与他一同编修西方四书直解的法国人殷铎泽 (Prosper Intorcetta), 比他们年轻一些的比利时人安多 (Antoine Thomas) 等。鲁日满的西文姓中 rou 这个音节的法语发音恰与汉字“鲁”近似, ge 的发音与“日”字更是相似, 带鼻化元音的音节 ment 变成了“满”字, 稍显不足。这种命名法被利玛窦运用到了学术传播活动中, 他在介绍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说时, 首次将这位数学家的名字汉化成了“OUJILI”<sup>[3]198</sup>。

## 2. 半音译半意译的中文名

这部分传教士的中文名更具趣味性, 因为其中文姓的用字与自西文姓氏的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利玛窦的得力助手熊三拔 (Sabbatino de Ursis) 神父。其西文姓氏 Ursis 同现代意大利语中的 orso 一词, 是“熊”的意思, 恰巧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熊”这个姓氏, 于是便被这个意大利人借用了。而他的名字“三拔”则音译自西文名的前两个音节。又如他的同胞石方西 (Francesco de Petris) 神父, 西文姓 Petris 意为“石头”, 正好切合中国的“石”姓, “方西”二字则音译自西文名的前两个音节。这种起名方式还被利玛窦用到了自己的老师头上, 他的《同文算指》一书译自其数学老师 Clavius<sup>①</sup> 的《简明实用数学》(Epistome Arithmaticae, 1585)。在介绍原书作者时, 利玛窦称之为“丁先生”。“Clavius, 拉丁文原意为钉, 故利氏译称丁先生”<sup>[2]79</sup>。中国人不以“钉”字为姓, 利玛窦在意译其姓后, 使用了谐音的技巧, 这才找到了合适的汉姓。

这一类的中文名数量比较少, 其原因有二: 第一, 西文姓的原词义大多已经为人们淡忘了, 只能在辞源中查到; 第二, 西文姓的原词义依旧为人们所熟知, 与其意义相同汉字在汉语中也未必能够作姓, 即使用谐音, 也不易找到对应的合适的汉姓。利玛窦的意文姓 Ricci 意为“刺猬”, 但这两个字都无法在汉语中充作姓氏。

## 3. 半音译半自主命名的中文名

部分传教士的中文名中或姓或名音译自西文名的部分音节, 而另一部分与西文名无关。如意大利人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 其汉姓“龙”取自意大利文姓中的 Lon 这个音节, 而“华民”二字则与西文姓名无关。葡萄牙人利玛弟 (Matias de Maia),

其中文名“玛弟”显然取自 Mati 两个音节, 而汉姓“利”却与葡文姓名没有关系。此外苏霖 (Joseph Suarez)、傅圣泽 (Jean-François Foucquet)、洪度贞 (Humbert Augery) 等一辈皆是如此取名的。

## 4. 自主命名类的中文名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日益了解, 其中一些人开始更倾向于选取与自己西文姓名完全无关的中文名, 其汉姓多是百家姓中常见的姓氏, 而名字的用字则常常出自儒家经典, 或者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因而较之利玛窦等前辈的中文名更为地道。其中典型的如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ns), “文思点出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故《诗·周颂》有篇名曰‘思文’, ‘文思’为‘思文’之倒”<sup>[4]81</sup>, 又如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汤尚贤 (Pierre-Vincent de Tartre)、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等名字似乎更应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国儒生。值得注意的是, 选用此类中文名者, 来华时间普遍比较晚, 多在康乾盛世, 而且以法国人居多, 他们的传教工作起步较晚, 但成果丰硕, 其中还有人有幸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召见, 如聂仲迁 (Adrien Grelson) 等。

## 二、方言对传教士中文名构成的影响

纳日碧力戈先生在其大作《姓名论》中指出: “方言的差别有时也会在姓名上有所反映, 不同方言区的姓名在发音、选字等方面, 带有本地特点。”<sup>[1]92</sup> 由于两个世纪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 学习中文的地点各不相同 (欧洲、印度、澳门、中国大陆等), 他们在华工作的地区和当地使用的方言间也有差异, 因而很多传教士的中文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不同方言的色彩。如利玛窦的“玛窦”二字, 若用普通话念, 则与意大利文名 Matteo 的发音相差比较大, 而用广东话念起来则要接近得多。而他恰曾在广东客居多年, 方才获准进入中国内地, 他的中文基础学习主要是在澳门和广东完成的, 这个中文名也是在广东时便开始使用, 因而在他寻找与 Matteo 发音相近的汉字时, 很有可能受到了广东方言的影响。

又如埋骨于我国台湾的高母羨 (对这种写法, 方豪先生曾有解释: “三个字原来都应该加口字旁

① 多数文献中作 Clavius, 独史景迁之《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中作 Clavus, 疑为笔误。

的,因为不方便刻字,所以我都省去了”<sup>[2]83</sup>。笔者此处遂效先辈之法),其中文名若用普通话念,似乎与其西班牙文名 Juan Cobo 毫无关系,但若用闽南语念起来,便会发现他是将西语名调换了顺序。“高母羨”与 Cobo Juan 的发音几乎一模一样。而这个加上口字旁的“羨”字,也主要是在福建、台湾一带使用。根据一份 1984 年的五省份统计资料,在同样 25000 个人名当中,福建的“羨”(加石字旁的)字出现了 88 次,而在其它省的统计资料中并未见到<sup>[1]192</sup>。显然,闽南语在 Juan Cobo 的中文名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此外,王丰肃、罗明坚等著名传教士的中文名也都受到了方言的深刻影响,在此不一一赘述。

### 三、传教士中文名构成中的历史传承性

在近两个世纪的来华活动中,大批的传教士选用了中文名,形成了一定的取名习惯。在这众多的名字中,包涵着一定的历史传承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现象上:

“利”字在汉语中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利玛窦当初完全可以选择发音和 RI 也很近似,但在汉语中更为常见的姓氏,如“李”、“黎”等,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详细记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利玛窦在对中国情况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的选择。如果说利玛窦选择“利”字是一种巧合,那么利类思、利安当、利玛弟等人对中国的姓氏已然相当了解,却仍以“利”为姓,又是为何?有“汉学之父”美誉的利玛窦在中西交流中的成就世所共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使者”<sup>①</sup>。一些西文名与“利”字毫无关系的传教士,以其为姓,很可能是出自对前辈的敬仰以及对其成就的肯定。这种逻辑似乎也可以用于解释庞迪我与其后辈的“迪我”们(穆迪我、刘迪我等)之间的微妙联系。

来华传教士西文名同源者甚多。西文名为 Francesco、Francisco、Franciscus、François 一类同源名的著名传教士甚多,其汉名多为“方西”、“方济”、“范济”之类,如石方西、巴范济、傅泛济、毕方济、李方西等。而西文名属于 Jean、Joannes、João 等一类的传教士多自名为“若望”、“儒望”等。由于早在景教盛行之时,就有西来教士被称作“若望长老”,估算起来,至汤若望、罗儒望、孟儒望等人活跃的年代,已有数百年,因而“若望”多少体现

了传教士对中国习俗的遵从和一定的融合精神。而以“儒”代替“若”不过是在这种遵从基础上的进一步改版,以期更好地融入中华文化的氛围中。

### 四、传教士中文名的历史意义

姓名是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社会产物,是社会、历史和心理内容的一种反映。“姓名的内容是社会与历史内容的一部分”<sup>[1]83</sup>。传教士的中文名是特定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状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们如化石般,依旧包裹着历史的星星点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1. 中文名是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身份标签

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母语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语言,加上教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它们在语法结构上与汉语有着巨大的区别。中国民众对外界知之甚少,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夷夏”的二元模式中,掌握上述西方语言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针对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以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们长期本着天主教本土化的指导思想,以开展传教工作。关于本土化的工作,罗明坚曾经如是说:“为把中国基督化,我们已变得像中国人(Siano fatti ut Christo Sinas Lucrifaciamus)”<sup>[5]</sup>。要像中国人,至少得首先有个中文名字吧。民众对于长串的拉丁字母拼写的名字、陌生的发音是很难接受的。这客观上要求传教士的名字必须以潜在信众们容易辨识的形式出现。而名字的可接受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人本身固有的惰性倾向,要求在姓名称谓中尽可能省力,用较少的具有普遍性、好记、好念的姓名来辅助交际”<sup>[1]124</sup>。用汉语,按照中国人习惯的取名方式指称这些异邦人士,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林金水先生告诉我们:“利氏采用的中国式名字,它开西洋人取中国名之先河”<sup>[6]1</sup>,而方豪先生则认为,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是“前乎利氏”<sup>[7]691</sup>使用汉名的。谁先谁后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来华传教士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逐渐为国人所认识。姓在前、名在后的中式姓名“利玛窦”当然比带大舌颤音的 Matteo Ricci 更容易为国人所认识;“卫匡国”三个字无疑也比绕口令般的“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 的完全音译)容易上口得多。

① W·弗兰克勒.利玛窦,录于《明代词典》1137~1144。

## 2. 中文名的发展变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有了中文名, 获得了容易辨认的身份标签,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向中国介绍他们的思想和文化, 赢得更多的认同。为了得到中国知识界的认可, 传教士们奉行“耶儒合一”的策略。如果说起初他们只是要把自己变得像中国人的话, 那么后来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变得像中国的儒生。在以“合儒”为主要内容的本土化进程中, 来华传教士努力学习中文和儒家经典, 随着中文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加深, 他们不断地丰富着自己中文名的内容, 以期越来越“合儒”的名字和日益增长的儒学知识、儒袍儒帽、儒家礼仪、轿子等物一道, 成为帮助他们争得更多认同的工具。从时间顺序上讲, 自主命名类的中文名的出现, 明显晚于音译类的中文名, 而且年代越近, 出自典故的名字就越多, 其汉名选字也越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这足以说明传教士来华后对中国了解的逐渐加深。

很多人不仅有汉姓、汉名, 后来还和中国本土生长的文人学士一般, 有了字, 有了号。如利玛窦号西泰、西江、大西域山人, 艾儒略字思及, 罗明坚字复初, 邓玉函字涵璞, 利类思字再可, 典出《论语·公冶长》。足见传教士们凭借“合儒”, 争取中国文人支持的愿望。

以传教士汉名汉姓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称谓语, 又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传教士的接纳程度。佩服利玛窦的才学的中国人, 称其为“利先生”甚至“利子”。天主教一时间成了“利氏学”或“利氏之教”。“上海钟表业都奉利玛窦为祖师, 有‘利公’塑像”<sup>[2]73</sup>。而他在中国的对头们则蔑称他为“利妖”。与其来往的文士俨然将“利”这个译音当成了利玛窦的本姓了。康熙年间, “西堂老人”尤侗曾为他题竹枝词一首, 其间有“杯酒还浇利泰西”<sup>[2]81</sup>之句。为了念起来好听, 他干脆将利氏的字“西泰”颠倒成了“泰西”, 这种文字技巧通常只用于国人的名号, 看来尤先生心理上真的接纳利氏了。

汉姓汉名有时也会被传教士用于称呼自己。“在他(利玛窦)送给程大约的画的题记中, 他将自己的汉语姓名用西文字母写出: 有两次他将自己看作‘一个来自欧洲的人’, 并将自己的姓名写作‘ri’, 有两次他将自己看作一个耶稣会会员, 在这些时候, 他将自己的姓名写成罗马字母‘ly’。”<sup>[3]231</sup>

现存很多文书中, 利玛窦多以“窵”自称。由此不难看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

## 3. 中文名常常能体现传教士的抱负与成就

来华传教士们的中文名选字大多能够体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更确切些就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这种倾向体现了传教士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被中国知识阶层接纳的期望。具体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 其中文名又常常成为其个人抱负的概括。

艾儒略通晓中华典籍, 有“西来孔子”的美誉, 其中文著述甚多, 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的方方面面。连当时反对天主教的学者都承认“其立言甚辨, 其持躬甚洁。辟二世而宗孔子, 世或喜而信之, 且曰圣人生矣”<sup>[2]188</sup>。如此人物, 也不负“儒略”二字了。

王丰肃曾因南京教案被驱逐出境, 后复入中华, 改名“高一志”, 取“志向高远”之意。尽管屡遭地方势力排挤、诬陷, 他从未停止自己的工作, 终能以著作宏富文笔畅达著称<sup>[2]152</sup>, 龙华民长期致力于钻研中文典籍, 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无愧于“华民”二字。

中国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 被誉为“研究孔子的历史学家”<sup>[8]311</sup>, 其道德文章果真做得明白。他的《孔子传》、《孔子大事略志》、《孔门诸大弟子传》, 是西方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重要文献。

此外, 宋君荣、方德望、卫匡国、汤尚贤、蒋友人等人也都有以汉名明志的倾向, 在此不一一赘述。

## 参考文献:

- [1] 纳日碧力戈. 姓名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2]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 史景迁. 利玛窦的记忆之官——当西方遇到东方[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 [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5] 柯毅林. 本土化: 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J]. 杭州: 浙江大学学报, 1999(1): 21-24.
- [6] 林金水. 利玛窦与中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7] 方豪. 中西交通史(下)[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8] 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